

全球公共產品與美國霸權

◎ 辛本健

一 美國霸權力量的現狀

冷戰的終結帶給美國兩大戰果：主要敵手蘇聯分崩離析，而美國自身的聯盟體系不但沒有隨之消散，反而有所擴展。在二十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不斷衰退，日本陷於滯脹狀態，而美國卻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富有活力的經濟擴張期之一。儘管圍繞美國衰落與否紛爭不斷，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其他國家至今只能望其項背而難以與之抗衡。在此前提下，美國當仁不讓謀求主導性霸權優勢，不僅是出於「天定命運」的「使命感」的驅使，更有強悍的綜合力量為後盾。美國學者克勞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認為：「海灣戰爭標誌著『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建立。世界將默認一種美國的仁慈霸權。」¹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書中指出，美國「在軍事、經濟、技術、文化等四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方面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是有史以來「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²。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9年發表的〈孤獨的超級大國〉一文中也認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在力量的各個領域——經濟、軍事、外交、意識形態、技術和文化方面都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³。著名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最近也以「新羅馬帝國」為題，宣稱「當前的國際體系的最獨特之處在於，美國在所有的領域都同時處於主宰地位」⁴。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美國的霸權力量仍在不斷增強。軍事上，美軍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有駐軍，有大約3,000個軍事基地。美國2003財年的國防預算高達3,930億美元⁵，佔全球軍費總支出的36.3%⁶，超過位於其後國防支出最大的15-20個國家的軍費總和⁷。美國擁有「佔絕對優勢的核力量，全球主宰性的空軍，唯一的、真正的遠洋海軍，以及在全球投放打擊力量的獨一無二的能力」：「由於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軍事研發支出上的巨大差距——美國三倍於僅次於它的六大軍事強國的軍事研發支出的總和，華盛頓已經使別國無力在軍事上趕上它」⁸。

美軍的高科技武器不斷進步，海灣戰爭期間，美軍要對同一個目標每天進行約3,000次轟炸，才能實現預定結果；而在阿富汗戰爭中，只需每天對同一個目標進行200次轟炸，就能實現預定結果。阿富汗戰爭的美軍司令弗蘭克斯（Tommy Franks）說，在海灣戰爭期間，美軍需要十架飛機來轟炸同一個目標；而在阿富汗戰爭中，一架飛機每次出擊都能夠轟炸兩個目標⁹。

經濟上，美國經濟十年來持續增長，目前其GDP規模仍佔全球31.2%¹⁰，幾乎相當於緊隨其後的日、德、法等國GDP的總和，相當於中國的八倍¹¹；美國在全球經濟的三大領導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都擁有最大的發言權。美國是全球熟練技術人

才的首選目的地，這一地位在二十世紀90年代進一步鞏固。美國也是最受外國公司歡迎的目的地，在1999年，美國吸引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1/3以上¹²。

科技方面，美國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領域，都擁有明顯的優勢」¹³；「在最關鍵的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美國至少領先歐洲五年，領先日本十年」¹⁴。2001年美國的研發支出為265億美元，佔全球研發總額的40.6%¹⁵，幾乎與緊隨其後的七個最富裕國家的研發支出總額一樣多。

文化上，從可口可樂、麥當勞到迪斯尼，從好萊塢到CNN、NBA，美國文化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強勢文化」。地方性的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生活方式，正被全球範圍對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和跟進之風所吞噬，許多人擔心，「要不了多久，整個世界就會變成完全美國化的一個城鎮。」¹⁶美國著名學者沃爾特（Stephen M. Walt）指出，「當今的全球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國文化力量的典型產物」¹⁷。200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認為，美國文化「倡導個性、責任、自由選擇權、智慧、完美和成就感。……由於美國文化的上述優點，其他比較僵化的文化體系最終將被它打得一敗塗地」。美國保守派刊物《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也在今年宣稱，「美國的文化實力是美國主宰世界的最深廣的力量源泉。美國的單極霸權……是來自於它的文化。」¹⁸

基於上述事實，新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沃爾茲（Kenneth N. Waltz）坦言，「哪個國家，或者哪些國家具有物質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意志，能夠結束美國的『單極時刻』呢？」¹⁹美國戰略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今年預測說，「在未來幾十年裏，美國在軍事、經濟、技術和文化方面仍將在世界上獨佔鰲頭。」²⁰布什政府在2001年1月上台後，更全力高舉單邊主義大旗，希望建立一個擁有「絕對安全」的「美利堅帝國」。

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美國與西方其他大國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美國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國際秩序，根據其假定的威脅源，敦促所有大小盟國配合它的經濟制裁、軍事打擊、維和或人道主義干預行動。不管人們在主觀上是否接受美國是一個「能力大到不能被抗衡的超級霸權國家」的事實，美國無疑擁有下述能力：

1、行動和「話語」霸權。當美國決心要做甚麼時，它可以完全無視別國的意見，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阻止它。美國在今年6月13日正式退出《反導條約》並加速研發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即為美國擁有行動霸權的最近實例。

另外，布什（George W. Bush）在組建反恐聯盟時宣稱，「要麼同我們站在一起，要麼同恐怖份子站在一起」，迫使各國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在今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又給朝鮮、伊朗、伊拉克貼上「邪惡軸心」的標籤。而「無賴國家」、「失敗國家」的說法也全部出自美國之口，其「話語」霸權可見一斑。

2、美國在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適合其自身利益時利用它們；在國際組織不支持其做法，或者國際制度妨礙其行動時，「美國就撇開它們並使之癱瘓」²¹。

3、美國可以自行決定軍事聯盟或軍事打擊對象，北約東擴的首批吸納國家（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的確定，科索沃戰爭與海灣戰爭結束後對伊拉克的多次狂轟濫炸，都是完全依照美國的意願來實施的。另外，在過去十年，美國在指導德國統一問題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就結束北朝鮮核武發展計劃談判達成了協議；並且說服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放棄從前蘇

聯繼承的核武庫。

4、美國有足夠力量在全球威懾和阻止對美國霸權構成潛在挑戰的行動。由於美國同其他主要國家之間的壓倒性差距，「真正的（制衡美國的）均勢行動要付出高昂的經濟和政治代價，無論是俄羅斯、中國，還是其他任何大國，都不願承受這些代價」²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或非國家集團願意招致美國「敵意的聚焦」，「那些招致美國敵意的國家和集團（諸如利比亞、伊拉克、塞爾維亞和塔利班）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²³。

5、美國擁有維持霸權的強大經濟與文化後盾。目前，美國的「新經濟」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其資源稟賦充足，科研條件得天獨厚，全球高科技人才被源源不斷地吸引到美國，「每年有50萬外國學生希望前往美國學習深造，歐洲人和亞洲人想要看美國電影，美國的自由民主在全球的許多地區都具有吸引力」²⁴。因此，單從經濟與文化上看，預期美國霸權在未來幾十年內衰落是不太現實的。

二 美國霸權力量的不均衡分布

但是，在「九一一」事件中，恐怖主義「在美國傲視全球的時候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徹底暴露了美國不堪一擊的脆弱性」²⁵，也暴露出美國霸權力量的分布極度不均衡：其全球第一的軍事力量，無法阻止恐怖份子用民航班機對其發動「非對稱性攻擊」，甚至其軍事中樞五角大樓也遭到襲擊。這印證了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納伊（Joseph S. Nye）的觀點：「單極的概念是誤導性的，因為它過份誇大了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領域能夠為所欲為的程度……美國的力量不過是貌似強大。」²⁶

納伊在其今年1月出版的《美國力量的悖論》（*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提出「三維棋盤論」，指出在全球信息化時代，力量在全球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形式，類似於一個三維棋盤：「在棋盤的第一層，軍事力量的分配基本上是單極的，美國的軍事力量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但在棋盤的第二層，經濟力量的分配卻是多極的，美國、歐洲和日本佔世界產品的2/3；棋盤的第三層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國關係，力量在這一層次的分配已經大大分散化」²⁷。

我們不妨借助「三維棋盤論」來分析美國霸權力量的分布現狀：美國在軍事領域確實獨步天下。但是，「單獨的軍事力量不能，而且永遠不能解決美國力量在『美國世紀』所面臨的諸多挑戰」²⁸，正如美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Hugh Shelton）所言，「美國軍隊是一個使人恐懼的錘子。但是，並非所有的難題都是一個釘子。」²⁹在經濟領域，歐盟與日本已同美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歐洲國家和日本已經注意到美國經濟霸權在日漸衰退，並迅速採取了行動。歐元的流通和歐、日敢於同美國大打「貿易戰」即為明證。美國學者賈吉（Clark S. Judge）指出，「即使在十年前，有誰會想到歐洲人竟能在今天成功地阻止了兩家美國大公司（通用電器公司與Honeywell公司）的合併，或者對一家美國大公司（微軟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訴訟？只有經濟力量的變化才使得這些行動成為可能。」³⁰而在跨國關係領域，如環境惡化、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擴散、防止和解救金融危機、根除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美國軍事與經濟力量並不能確保成功，有時還動搖而不是增進美國的目標。例如，美國目前雖然以反對恐怖主義作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重點，但美軍僅僅摧毀了阿富汗境內的

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 (al Qaeda) 勢力，美國大眾仍然生活在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與恐懼之中，沒有太多的安全感。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最近調查「基地」組織對美國威脅，所得的結論是，「在阿富汗的戰爭未能減少對美國的威脅。相反，這場戰爭由於把潛在的襲擊者驅散到了一個範圍更加廣泛的地理區域內，因此可能已經使反恐怖努力變得更加困難。」³¹

法國評論家莫西 (Dominique Moisi) 指出，「沒有美國的參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無法完成，全球化時代仍然未能改變這一事實；然而，新的行為主體的大量湧現，意味著美國單槍匹馬幾乎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納伊總結說³²：

美國的力量在經濟層次和跨國層次上是無法與美國的軍事力量相提並論的。……諸多的跨國性問題——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傳播或全球氣候變暖——只有在許多國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夠加以解決。在那些只有通過國際集體行動才能取得美國想要得到的結果的領域，我們的力量確實是有限的，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

三 全球公共產品與美國的霸權維持戰略

信息革命與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兩大特徵，信息革命的後果是自由的信息、經濟流動、跨國效應、因特網超越國界、軟力量地位的上升、主權的變化等等。許多非國家行為體從信息革命與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力量，正如「九一一」事件所顯示的那樣，恐怖組織就增加了其影響世界政治的能力，「恐怖主義是戰爭的私有化」³³。在今天經濟與信息高度全球化及全球相互依存度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與政治安全已被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安全的綜合體所取代。納伊警告說，如果美國「以欺壓性的、單邊主義的方式來運用其硬力量」，那麼，別的國家將被迫聯合起來，組建制衡美國的聯盟；非國家行為體也會找美國麻煩。在多元化、開放性國際社會中，利益的交叉融合使得美國不得不接受納伊的建議，更加關注自身霸權結構中的薄弱環節，希望尋找新的戰略資源來彌補其軍事、經濟霸權力量的局限。

筆者認為，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霸權越來越體現在美國大眾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對全世界的影響和滲透上，即更體現於冷戰後美國「軟霸權」³⁴的迅速膨脹與無形擴張上。納伊認為，美國憑藉傳統硬力量及新型軟力量足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具備政治領導能力和戰略遠見來將這些力量資源轉化為實際影響力。」³⁵

美國目前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和科技等硬力量優勢為後盾，一方面借助經濟「胡蘿蔔」和軍事「大棒」（傳統上的硬力量）威脅、利誘別國遵從美國的政策、意志；另一方面，它開始實施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Public Goods) 的戰略，即採取維持地區均勢、確保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主導國際機制的制訂並維持其有效性的戰略，來鞏固和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按照經濟學的定義，「公共產品」是「每個人都能夠消費而不會減少其功用的東西」³⁶。例如，國防設施、公路和燈塔等都屬於公共產品。「霸權穩定論」的創始人、美國學者金德爾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把公共產品的概念引入國際政治研究。他認為，在國際政治領域，同一國國內開放的市場經濟一樣，也存在公共產品。國際關係領域的公共產品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建立在最惠國待遇、非歧視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基礎上的自由開放貿易制

度；二是穩定的國際貨幣；三是國際安全的提供。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試圖在充當世界警察的「過度擴張的帝國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的孤立主義之間，找出一條中間道路。一方面，在國際實踐中，美國的實力並沒有看上去那樣有效力，不能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美國將繼續保持超強霸權的地位，這使美國尋求繼續維持一定程度的國際秩序。具體而言，美國在其本土之外擁有國家利益是出於兩個顯而易見並相互關聯的原因：第一，外國發生的事情可能會殃及美國；第二，美國想要在一系列問題，如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毒品、貿易、能源和生態破壞上，對遠離美國政府或組織施加影響。正如「九一一」事件所顯示的那樣，即使貧窮偏遠的阿富汗也能夠窩藏危害美國的恐怖份子。因此，納伊指出，要解決美國無力單獨完成的諸多難題，必須「理解美國的霸權與全球公共產品之間的關係」³⁸。

通過向國際社會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戰略，美國可以得到雙份收益：從全球公共產品本身獲得收益；從這些公共產品使美國的霸權合法化中獲得收益。美國認為，它應該汲取十九世紀英國的經驗。英國當時為維持其霸權而提供的三種公共產品是：（1）在歐洲維持各個主要大國之間的均勢；（2）建立並促進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3）維護開放的國際公共性，如公海自由和打擊海盜等。

當前，美國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的數量與範圍，已遠遠超出十九世紀的英國。美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戰略，至少包括以下三點主要內容：

1、美國努力維持世界重要地區的均勢，確保其全球霸權不受地區大國挑戰。

在美國歷史上，自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明確將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均勢戰略相結合以來，總體而言，二十世紀美國外交策略是十九世紀英國外交策略和馬漢海權學說及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用不斷製造小國、特別是海上島嶼小國的方法，確保海上運輸線、地緣和資源關鍵地區控制在美國（至少也是其盟國的）手裏³⁹。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曾斷言：「人類歷史上唯一我們能夠擁有的和平的延伸時期是我們建立起了均勢。」⁴⁰在2001年9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美國把「防止敵對力量主宰關鍵地區，特別是歐洲、東北亞、東亞瀕海區、中東和西南亞」作為其「永恆的國家利益」⁴¹。為維持上述地區的美國主導下的均勢，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都保持了十萬前沿駐軍，在波斯灣保持了近二萬駐軍。

為了防止地區性的主要大國，包括歐洲的德國和法國、歐亞大陸的俄國、東亞的中國、南亞的印度、西亞的伊朗、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在它們所在地區威脅美國的霸權，美國致力於同這些地區的二等地區強國，如歐洲的英國、歐亞大陸的烏克蘭、東亞的日本、南亞的巴基斯坦、西亞的沙特阿拉伯、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建立聯盟或親密的關係，以平衡相應地區主要大國的權力，從而實現美國主導的全球性均勢，維護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認為，加強與日本的軍事聯盟和有限度地支持日本擴大軍力可以遏制中國；美英特殊關係可以平衡統一的歐洲的權力；加強與烏克蘭、阿根廷、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的聯繫分別可以抵消俄羅斯、巴西、伊朗、印度在本地區的實力。

在歐洲，美國一直把北約作為「留住美國、趕走俄國、制約德國」和「保持美國對歐洲國家的外交、軍事和安全政策的控制權的一個工具」⁴²。美國通過北約東擴，推行北約「戰略性概念」，使「歐洲國家事實上成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國」⁴³，德國和法國自然只能接受美國對

歐洲的領導權。借助控制歐洲的經驗，美國目前在亞洲也在實施均勢戰略，即讓日本、中國、俄國及印度等國在均勢中相互制衡，以達到美國對該地區的控制。

2、美國一直致力於建立並促進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

1995年，在美國的主導下，世界貿易組織正式取代「關貿總協定」，為鞏固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解決全球貿易糾紛提供了組織、體制上的保證。美國認為，確保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既有利於美國擴大市場和實現經濟增長，又能夠在其他國家培育「以健康的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穩定的、民主的社會」。為保持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性，美國一方面抵制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一方面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力求創造一種穩固而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自由貿易環境。但是，從客觀上講，美國確實借助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為世界經濟制訂了通行的規則和制度。

3、美國有選擇地維護國際規則與制度（通稱國際機制）的有效性與權威性。

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是指在有關國際關係特定問題領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確規則的制度⁴⁴。當前的國際機制幾乎涉及國際關係的各個領域，既包括國家權力的分配、利益分享所必須遵循的原則、規範，又包括國際貿易機制、國際金融貨幣機制、海洋及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機制等，因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日益凸現。美國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霸權國建立霸權的手段或方式，就是「建立管理和控制國際事務、國際體系的各種國際機制，並脅誘其他國家參加，從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權體系」⁴⁵。

美國是當今國際機制的主導者和主要制訂者⁴⁶，它一貫重視制訂有形和無形的國際法規、規則和制度，力圖操縱現存的國際組織，按照美國的意願和利益建立或拋棄相關的國際機制，以維持其霸權。美國主導或組織建立的，並努力予以維護的國際機制包括核不擴散機制、導彈技術控制機制、知識產權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等。美國以經濟或軍事制裁來懲罰違反這些國際機制的國家，以維護相關國際機制的權威與效能。例如，1998年，美國因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核試驗而對它們實施了經濟制裁；北朝鮮和伊朗都因「擴散導彈技術」而受到美國制裁。但當美國認為某些國際機制妨礙其實施霸權戰略時，就會一腳把它們踢開。例如，為了研發和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在今年6月13日正式退出《反導彈條約》；為了對伊拉克、南斯拉夫聯盟進行單邊主義的軍事打擊，美國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為了實施其新的核戰略，美國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條約》等。

綜上所述，美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戰略，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⁴⁷：

- （1）維持全球重要地區的均勢；
- （2）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
- （3）保護國際公共性（International Commons，如公海自由等）；
- （4）維護國際規則與制度；
- （5）援助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
- （6）充當聯盟的召集人與分歧的調停人。

可以預見，在新的世紀裏，為維持其超級霸權的地位，美國在依賴傳統的硬力量（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同時，將不遺餘力地推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戰略，即把新世紀的美國霸權建立在美國具有提供各種世界公共產品的能力的基礎上，因為這不僅是美國霸權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美國霸權合法性的基礎。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對美國的歷史性考驗，將是「美國能否把當前的超強實力，轉化為國際社會對美國的支持與贊同；把美國的原則轉化為被廣泛接受國際性標準與規則」⁴⁸。

註釋

- 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in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ed.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105.
- 2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K. Brzezinski) 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32-33。
- 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36.
- 4 ; 7 ; 8 ; 12 ; 22 ; 26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 no. 4 (July-August, 2002): 23; 21; 22; 23; 27; 31.
- 5 *China Daily*, 27 June 2002.
- 6 ; 10 ; 15 A Survey of America's World Role, *The Economist* (29 June 2002): 4; 4; 4.
- 9 ; 28 ; 29 Kori Schake, Klaus Becher, "How America Should Lead", *Policy Review*, no. 114 (August-September 2002): 36; 42; 42.
- 11 《環球時報》，2002年3月25日，第6版。
- 13 朱斌：《當代美國科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10。
- 14 張敏謙：《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370。
- 16 ; 18 ; 30 Clark S. Judge, "Hegemony of the Heart", *Policy Review*, no. 110 (January 2002), 58; 59; 58.
- 17 ; 23 Stephen M. Walt, "American Primacy: Its Prospects and Pitfall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5, no. 2 (Spring 2002).
- 19 Kenneth N. Waltz, "East-West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載周榮耀主編：《冷戰後的東方與西方：學者的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232。
- 20 ; 21 *The Financial Times*, 2 February 2002.
- 24 ; 27 ; 32 ; 38 ; 47 ; 48 Joseph S.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no. 2 (April 2002): 238; 238; 238; 238; 243; 244.
- 25 Michael Hirsh, "The Death of a Founding Myth", *Newsweek*, Special Davos Edition (December 2001-February 2002): 18.
- 31 *New York Times*, 16 June 2002.
- 33 《文匯報》，2002年4月22日。
- 34 「軟霸權」是從「軟力量」的概念延伸而來的，納伊認為，「軟力量」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國際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88, 267。納伊在該書中詳細論述了「軟霸權」對於維持美國霸權的重要性。
- 35 同上書，頁215。
- 36 Paul A. Samuelson and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16th ed. (Boston: Irwin/McGraw-Hill, 1998), 36.
- 3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3), 56-61.
- 39 張文木：〈台灣問題與中國前途——兼評李登輝《台灣的主張》〉，《戰略與管理》，1999年

第5期。

- 40 "Nixon: Determined to Make a Difference", *Time* 99, no. 1 (3 January 1972): 9.
- 41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4.
- 42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1 (Summer 2000): 21.
- 43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a New Europ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0 (Summer 2000).
- 44 門洪華：〈國際機制與美國霸權〉，《美國研究》，2001年第4期。
- 45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29–38。
- 46 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125。

辛本健 法學碩士，中國軍事科學院外軍部助理研究員。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2年10月號總第七十三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